

现代性批判的承认维度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麻进余

(山西大同大学 浑源师范分校, 山西 大同 037400)

摘要:现代化在当代中国方兴未艾,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对现代性的追本溯源,需要回到黑格尔、马克思。通过对其文本梳理与思想史的勾勒,我们发现其对现代性的批判不仅实现了从理性批判到资本批判的范式转换,并且长期被遮蔽的承认维度也贯穿其中,黑格尔的相互承认及承认辩证法与马克思对其改造、扬弃成为两者对现代性矛盾(个人与社会或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进行和解与超越的不同承认方式或承认路径。承认维度的彰显为重新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中的承认思想对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现代性;承认维度;黑格尔;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8)02-0005-07

现代化在当代中国方兴未艾,与之相关的现代性问题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实际上,现代性问题在黑格尔、马克思那个“新时代”已经成为关注反思批判的重要论题,对现代性的追本溯源,需要回到黑格尔、马克思。而承认问题是近年来政治哲学所热议的重要论题之一。随着泰勒1992年所著《承认的政治》、霍耐特1994年所著《为承认而斗争》以及与南希·弗雷泽2003年合著《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等学术著作的出版与稍后这些著作在我国的翻译引荐,国内学界对承认理论的研究渐成气候。特别是霍耐特解读青年黑格尔的承认思想而努力建构“为承认而斗争”的道德承认哲学,不仅为新旧世纪之交政治哲学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1],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承认视角或维度。通过对黑格尔、马克思的文本梳理与思想史的勾勒,我们发现其对现代性的批判不仅实现了从理性批判到资本批判的范式转换^[2],而且长期被遮蔽的承认维度也贯穿其中。黑格尔的相互承认及承认辩证法与马克思对其改造、扬弃成为两者对现代性矛盾(个人与社会或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进行和解与超越的不同承认方式或

承认路径。承认维度的彰显为重新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中的承认思想对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现代性问题的缘起与研究主题之关联

“现代”一词进入人们的日常话语并形成一种新意识是在19世纪初,而现代性的奠基过程与问题积累至少已有三百年的历史,其重大事件有文艺复兴的文化思潮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新世界的发现”。黑格尔把这些大事件看作区分“现代时期”与“中世纪”的时代分界线,对此,马克思则明确把“新航路”“世界市场”^{[3]562}等标志性历史事件和“16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时代”^{[4]823}作为现代社会的开始。按照吉登斯所理解的近两百年里社会理论探讨是围绕“什么是现代社会”^{[5]5}而展开,现代性可概括为现代社会的总体状况与基本性质,分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内涵,集中展现为现代社会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方面的总体特征。

现代化与现代性既紧密联系,又有所不同。现代

收稿日期:2017-12-15

作者简介:麻进余(1975—),男,山西浑源人,哲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地方文化等。

化描述的是现代社会生成发展的动态过程,现代性则是对现代社会的“质”的品性的概括。^{[6]2}可以说16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缔造了现代社会,也使得社会生活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现代性。现代性理论不同于现代化理论,它侧重于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批判,试图把握现代社会的矛盾,探究合理的发展路径与目标。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诸如经济危机、政治动荡、文化虚无、生态危机等问题,给人类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需要人们在现代性层面对现代化发展作出总体性反思批判,从而形成了现代性问题^{[6]1}。

西方现代化起步早于中国,对由此而出现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现代社会思想围绕着现代性问题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谱系。依据对现代性的基本立场,有人把现代社会思想分为现代主义(启蒙思想家与德国古典哲学家)、反现代主义(尼采与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利奥塔与福柯)、新现代主义(哈贝马斯与吉登斯)四种言路^{[6]6};也有人从左派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来描述现代性哲学话语^{[7]126}。前者没有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简单划入其中,说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辩证态度:既批判又建构;后者把马克思的思想归结在左派激进主义的范围,连同他之前的黑格尔,他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旨在表明这一派“对现代性持一种总体性的和辩证的批判,以及在基本立场上坚持对现代社会作出‘病理性的诊断’”^{[7]133}。本文不打算辨析马克思与黑格尔究竟是现代性主义者还是后现代性主义者,而是站在马克思,连同黑格尔对现代性所持的一种总体性和辩证的批判立场上,初步分析二者在对待、处理现代性矛盾(个人与社会或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上所呈现的承认维度(承认思想),以及二者承认思想之间的联系及其意义,则是本文所要做的工作。

二、黑格尔现代性批判的承认维度:从爱的调和到伦理国家的和解

对现代性进行激进批判肇始于卢梭。卢梭提出了文明是自然的异化的观念,即“人与外界自然的背离”与“人与内在本性的疏离”,这两个层面的异化“都是社会发展造成的疏离”^{[8]63}。不同于卢梭对现代性激进批判的浪漫主义,黑格尔把时代历史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确立了规则——启蒙的辩证法,即“现代性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9]19-20}。在其哲学视野中,现代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主体性所创生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反映在社会层面上就是

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可以说,对现代性的颂扬与批判一同进入了黑格尔的理论视野,那么在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过程中承认维度是如何出场、又是如何推进的呢?

(一)《耶拿手稿》开启现代性批判的承认之维

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汲取了康德、费希特以及同事谢林对现代性问题的考察成果,形成了现代性的哲学话语。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集中反映在其《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原理》等著作里,这些著作成书早于《耶拿手稿》(包括《伦理体系》和《实在哲学》),但后者开启了对现代性批判的承认之维。

早年的黑格尔对康德、费希特所建构的主体性理论并无异议,表现在实践倾向上热衷于当时的法国大革命,但法国的革命并没有走向民主而是滑向了专政。过分张扬的“主体性”可能会走向极权主义,黑格尔对代表现代性的“主体性”发生转向,开始探求没有主体间矛盾冲突的现实之路。这也是一直困扰从康德、费希特到谢林关于主体与客体何以一致(同一)的问题,在黑格尔看来,两者一致或同一不只是建立在应当的基础之上,而应是现实本身赋予的。

在《伦理体系》中,黑格尔沿着承认的路径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化进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初步揭示了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对立。他在费希特阐发的承认思想雏形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间的相互承认”,按照承认的三段结构——“自然伦理”“犯罪”“绝对伦理”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10]23-29}。在“自然伦理”阶段,一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爱的关系,二是物主之间的交换关系。前者的相互承认形式以家庭情感为纽带,其有限性非常明显,这需要从父母养育子女的“劳动”过渡到社会需要的“劳动”关系之中,即后者的物主交换关系,但这种承认关系是纯粹形式的,个体存在的特殊性被忽略掉了。在“犯罪”阶段,主体间的冲突破坏了“自然伦理”主体间的和谐结构,表现为自然的破坏、抢劫他人与侵害他人名誉,这一阶段处在社会伦理发展的中间阶段。在“绝对伦理”阶段,它是社会伦理发展的最后阶段,个体不仅在主体间获得法律的认同,而且应该在共同体中获得对他的“特殊性”认同^{[11]23}。由此,对主体间承认关系的探讨首次“从形式层面过渡到实质层面”^[12]。

在接下来撰写的《实在哲学》中,黑格尔尝试通过构建精神的逻辑发展史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具体展现为“主观精神”“现实精神”与“绝对精

神”的逻辑发展进程,进一步揭示了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对立关系,这奠定了未来的成熟体系(《哲学全书》第三部分《精神哲学》)的雏形。在“主观精神”阶段,主观精神的出发点是对自我的充分经验,实践经验作为人类精神的工具活动,因而在劳动过程中,主体意识变成了“狡诈”,精神自我分化为男女“两极”,以爱的关系缓解其“存在的孤独”。这里,“黑格尔第一次使用‘承认’概念”^{[10]44}。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进入集体交往生活状态的不同家庭形成一种社会竞争关系,如“抢占财产引起的冲突解释成‘为承认而斗争’”^{[10]50}，“第一次直接引进这一模式”^{[10]46}。于是,陷入冲突的双方需要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社会过渡。在“现实精神”阶段,黑格尔分析了法律承认关系在市民社会中的积极意义。“人类按照法律承认关系组织人与现实基本关系”来“共同构成社会劳动系统”,交换的实质是“财产是以被承认为中介的”^{[10]57}。当然,“法律承认的具体化常常也会带来非法的可能性”^{[10]58},而法律强制力量使得破坏相互承认规则的主体的毁约行为沦为犯罪。犯罪行为促使法律扩展改进,以实现平等承认,其制度层面就是国家的确立。这样,便进入“绝对精神”阶段。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反思活动的制度体现,精神通过反思活动把现实性的自我呈现出来,这不同于《伦理体系》中国家被理解为基于主体间承认而和解的伦理共同体。在这里,“国家及其组织关系的确立是这种外化的终点”“目标是对国家的承认”^[12]。

(二)《精神现象学》与《精神哲学》架构承认的自我意识

在此,黑格尔借助辩证法对“自我意识”进行了阐释,建构了意识哲学的承认问题。

第一阶段是“欲望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欲望一般”,异化为“欲望的对象就是生命”^{[13]117},扬弃异化为“自我意识就是欲望”^{[13]120}。通过对欲望的阐释,黑格尔借助“占有”与“要另一个人承认”^{[14]198}的相关议题,把费希特“自我与非我的同一”的哲学构想引入经验的层面进行分析。这样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在相互承认的层面得到表达,进而成为真正的自我意识,“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13]122}。这里,黑格尔借助“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13]122}的探讨,揭示了主奴关系的辩证法,再一次明确以承认问题为思考的核心,反复强调“为承认而战斗”的命题:“承认过程是一场战斗”“只有通过战斗才能获得自由”^{[15]227-228}。第二阶段是“个别性和普遍性的联合”,即承认的自我意识。首先是“双

重的自我意识”^{[13]123};其次是“对立的自我意识的斗争”^{[13]125},即主人“独立的意识”与奴隶“依赖的意识”;最后是扬弃前面两个阶段后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13]127}。第三阶段是“普遍的自我意识”,即理性的自我意识。“与奴隶对立的主人还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他在对立中还没有完全看到自己本身。因此,只有通过奴隶之成为自由的,主人也才成为完全自由的。”^{[15]234}只有扬弃主奴的对立方面,才能达至普遍的自我意识。因此,“‘承认的自我意识’是从‘个别的自我意识(欲望)’到‘普遍的自我意识(理性)’的中介(中间环节),是‘个别性和普遍性的联合’”^[16]。

需要指出的是,承认的自我意识的运动在主奴关系的辩证运动中获得了经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承认辩证法就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现实中却忽视了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历史条件。另外,“黑格尔的‘承认问题’不仅仅局限于自我意识阶段,而且存在于精神外化与实现自身的整个过程中”^{[17]摘要}。为此,《精神现象学》与《精神哲学》所阐述的主奴辩证法是“片面的和不平衡的承认”^{[13]129},需要深化到《法哲学原理》以“所有权”与“劳动”^{[18]239}为中介的主体交往活动的相互承认中。

(三)《法哲学原理》中伦理国家对现代性矛盾的和解

就主人与奴隶的承认辩证法,科耶夫指出:“如果有闲的主人身份是一条绝路,那么勤奋的奴隶身份则是一切人的、社会的、历史的进步的源泉”^{[14]21-22}。如前所述,这将主奴关系提升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和黑格尔思想的关键位置。但是,这种激进的革命立场在《法哲学原理》中变迁为“一种对社会历史进行国家主义阐释的保守立场”,因而,“人与人的相互承认将分别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得到不同层次和不同程度的实现”^[12]。一是在家庭中得以实现的情感承认关系中,对“子女教育和家庭解体”^{[18]219}的探讨表明家庭的重要职能是培育未来市民社会的市民而非情感承认关系,子女经过被教育成为被法律承认的自由人格,使得家庭伦理解体和向市民社会过渡;二是在市民社会人与人相互承认的普遍实现中,对“警察和同业公会”存在的必然性与“相对性”“有限性”的探讨表明抽象形式的法只有“在自在自为的普遍目的及其绝对的现实中,才具有它的真理性”^{[18]279-295};三是在“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18]305}中,“通过国家的权威才能使形式普遍的法律承认关系获得其实质性的实

现”^[12]。至此,对承认结构的探讨进一步从形式层面进入实质层面。依据抽象法的形式承认关系变得具体,在国家中“初次达到它的真理和现实化”^{[18]309}。

由此,在黑格尔的视野中由于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而导致的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共同体对立的现代性矛盾在伦理国家中实现承认和解。需要指出的是,《法哲学原理》展现出黑格尔对现代性批判与诊断相联系思路。其对现代性的批判路径从“抽象法权”到“道德”,再到“伦理”;其批判对象集中展现为从对自由主义的外在自由的批判到对浪漫主义的内在自由的批判,再到扬弃前二者后形成的伦理总体,即现实的自由。其克服现代性矛盾的方案就是主体的伦理化和自由的具体化,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伦理化的方案中得以解决。

综上所述,黑格尔对现代性所带来的个人与社会或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和对立,始终以承认概念对其进行解释说明,最终实现现代个人主义与古典共同体的和解。而不是像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学者所认为的,存在着以“相互承认”机制解决问题的青年黑格尔和以“伦理实体”的形而上学实现诸神之和解的老年黑格尔的对立,这遮蔽了后期《法哲学原理》承认维度的彰显。霍耐特后来也坦言这存在着某种误解,并认为法哲学是“一种相互承认诸领域的规范理论纲要”^[19]。当然,在黑格尔建构的思辨体系中,其历史性主体是精神主体,这种从精神理论“承认的自我意识”到精神实践“普遍的自由意志”而达致的“具体自由的现实”承认,仍然是一种抽象的权利,其规划与解决之道陷入过分依赖主体性的唯心主义窠臼。因此,“黑格尔的承认方案抑或现代性的诊断无论持何种激进的语调,他的立足点始终决定了其本质上的局限性”^{[20]19}。

三、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承认维度:从异化承认批判到资本承认批判的超越

启蒙现代性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规划是现代人心中的梦想,如今依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黑格尔现代性批判理论所隐含的承认维度使得现代性矛盾实现了伦理意义上的和解;马克思继承黑格尔的问题意识与承认辩证法,而不满黑格尔法哲学的解决之道,对启蒙现代性进行了全面批判,主张通过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现代性的束缚,构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现代性。对现代性批判的“不同的解放旨趣和理论定位使马克思获得了与黑格尔完全不同的视阈”^{[20]65},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自由

人及其自由人联合体的真正承认。这超越了黑格尔现代性批判所构筑的伦理承认及其承认辩证法的抽象思辨性,揭示了其激进话语背后的保守性。尽管承认维度是贯穿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重要维度之一,但长期革命实践的惯性思维和对马克思现代性理论所作的简单化理解,遮蔽了其深邃复杂的承认维度。透过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承认维度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中表现为从劳动、交往异化的承认批判到资本承认批判再到自由人联合体的承认建构,从而实现了承认理论批判与承认实践建构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一)“巴黎手稿”中从劳动异化到交往异化的承认批判

在“巴黎手稿”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构成市民社会的能动机制——劳动着手,构建了批判国民经济的异化劳动理论,成为审视现代性矛盾的主要理论路径。在笔记本Ⅰ中,马克思通过考察三种主要收入形式:工资、利润和地租,发现了藏匿于市民社会中的内在矛盾及其现代雇佣劳动的异化性质,对连同黑格尔等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的劳动(异化劳动)及其根源“私有财产”作为现代性矛盾而加以批判;在笔记本Ⅱ与补入的“私有财产与劳动”(笔记本Ⅲ的部分)中,马克思探讨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已经体察到资本的现实客观性,认识到国民经济学所强调劳动的重要性,并在与重农学派、重商学派的比较中得出“一般劳动”^{[3]181}的概念;在笔记本Ⅲ中,马克思借助劳动这一基石与中介对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进行深入思考与论证,指出共产主义的生成运动需要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超越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在“巴黎手稿”之《穆勒评注》中,马克思论述货币、信贷以及劳动异化、人的社会关系异化等问题,强调从劳动异化到交往异化视角的根本转变:“已经不再单纯从生产过程的角度理解劳动,而是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角度来理解劳动,从而使劳动……得到了一种更具体更充实的规定”^[21]。

可以说,“经过劳动的中介,马克思才第一次清晰地表达出‘真正的承认’的内涵”^{[20]109},把劳动理解为一种实现主体间相互承认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现实劳动是与人的本质相违背的异化劳动,贫穷的工人与富有的资本家之间不可能在社会上获得同样的承认,即使在工人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的当今也是如此。因此,劳动异化的状态与趋势必然带来的是主体间承认的扭曲和异化,建立在异化承认基础上的社会关系也相应发生异化。为了

克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交往异化的现实,马克思一方面汲取《精神现象学》主奴关系围绕“为承认而斗争”的思路,把握异化形式的劳动中所蕴含的解放潜能,找到了通达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思想进程;另一方面,借助工业与科学等现代劳动形式,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 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下的资本承认批判

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承认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首先考察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533}。因此,真正的承认不是思想活动,与人们获得自由和解放一样,它的获得也是一种历史活动^{[20]93},它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3]527},它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3]528}。这说明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承认理论,而是从唯物史观的两个方面——生产力(劳动分工)与交往形式(即后来的生产关系)深入考察现实的人与社会发展中的承认状况及其承认关系。这种劳动分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物质财富的增加,但反过来统治着人们,个人本身的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对立的力量。在此,对承认的诉求,一方面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的异己力量实现自觉的控制和驾驭;另一方面,“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541}。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关系,剖析了市民社会(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唯物史观具体表现为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资本逻辑,蕴含其中的承认逻辑主要表现为对资本逻辑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形式和拜物教观念的全面批判。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是马克思经过了巴黎时期、布鲁塞尔时期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铺垫之后,又经过长达30多年的伦敦时期研究最终发现隐藏于现代市民社会中的矛盾,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逻辑决定现代性逻辑”^{[6]168}。在《1857—1858 经济学手稿》中,即马克思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反思批判黑格尔辩证法,首次明确肯定其《逻辑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22]25}的合理性。现代生产(劳动)是现代性生产与发展的根源,马克思认为斯密抛开创造财富

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进而概括“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即“劳动一般”^{[22]28}。当然,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一般”是现代性的客观历史抽象。黑格尔把劳动与市民社会的内在关联以思辨方式加以呈现,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把握的‘劳动’……是现代的范畴”^{[22]27}。然而,建立在现代生产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理想社会,作为市民社会代表的资产阶级国家也非真正民主制国家。可以说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适度分离,一方面促成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又启蒙现代性“政治解放”的完成。但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也产生了“分离”的趋势,马克思把这种分裂的根源追溯到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和分裂,“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3]500},这个世俗基础就是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可以说,《资本论》中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到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总体运动是对《逻辑学》的概念运动批判改造并创造性转化的结果^{[6]149},贯穿其中的拜物教批判被理解为马克思对“黑格尔承认辩证法的一种扬弃与升华”^{[20]102}。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主奴陷入了为承认而斗争的“恶的循环”,现实与历史维度的阙如使得他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种‘无主人的奴隶制’,而拜物教就是这种‘无主人的奴隶制’”^{[20]102}。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23]922},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逻辑所支配的现代性的全面异化,加剧了个人与社会、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资本承认的只是“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24]47}。“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25]267}然而,社会与个人之间的这种分裂、对抗,恰恰是实现个人与社会真正承认的前提与基础。马克思在批判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浪漫主义观点时就曾指出:“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只是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26]127}因此,对资本承认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关键环节,通过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

(三) 现代性矛盾的超越: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集中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在批判中包含着建构,破立并举,在

批判中蕴含着发展共产主义现代性的承认维度。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矛盾,马克思提出的合理方案的核心意旨在于,扬弃“共同体(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分裂对抗,实现二者的历史性整合。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建构共产主义现代性的现实途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这种共产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185}共产主义运动从本质是要扬弃资本逻辑所导致的个人与社会和个体与共同体(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分裂。为了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对立,共产主义现代性的社会基础要从根基上保障共同体(国家)与个体和社会与个人发展的统一。这个社会基础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阐述的人们之间社会联系与个性发展的关系中说得很清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经济结合体为“自由人联合体”创造条件,“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为“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形成的“自由个性”奠定基础^{[22]52}。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这个社会基础就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74}。这种新形式的所有制形成“社会占有”与“个人所有”之间的合理张力,有利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良性互动。

通过“改变世界”的实践策略构建的“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心目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承认的“真正共同体”,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53},“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571}。因此,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中承认思想的历史目标就是自由人联合体对资本主义社会即“民族国家”的扬弃。这就需要克服民族国家内部蕴含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以及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6]129}。现代市民社会是被资本全面异化的社会,扬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以及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成为对资本进行历史整合的前提与基础。如何整合市民社会的分裂从而扬弃现代性的分裂呢?马克思的方案是对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构想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方案的一种综合。为此,需要通过共产主义运动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来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找到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的合理路径。当然,在当代语境中可以把扬弃国家与市民社会分裂的革命方式转换为建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

的承认方式,拓展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与公共空间的人民民主实践新平台^{[6]130}。

四、结语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总体批判,其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承认维度就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批判基础上试图解决个人与社会或个体与共同体(国家)之间的现代性矛盾的独特视角与方法。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所推演的“恶的循环”到马克思所洞察到的无产阶级斗争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动力,从黑格尔的承认辩证法到马克思对其扬弃、改造后形成的实践—历史的辩证法,可以说马克思在黑格尔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思维的影响下,不断深究困扰黑格尔一生的关于现代性分裂与和解的宏大议题。黑格尔在对现代性矛盾的批判中,借助伦理—理性承认的国家阶段实现个人与社会或个体与共同体(国家)之间的和解,以取消彼此之间分裂、紧张的关系。而马克思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受物支配奴役的生存状态(劳动异化),及其由此引发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活动的异化承认的颠倒关系(交往异化),因而在对现代性批判的过程中,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揭示资本承认批判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真正承认的“自由人联合体”成为超越黑格尔伦理—理性国家的必然选择。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全球资本主义所交汇而成的承认语境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全球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地方版本^{[27]309}。但是,历史境遇下的“晚发外生”和现实境遇中的现代化区域间的不平衡性以及市场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使得中国现代化面临诸多矛盾与困境。如前所述,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所要构建的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这里我们把它创造性地转化为建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共同体。因此,在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承认的中介来协调个体价值与集体取向之间的矛盾,“形成个人、中介和共同体这样的三维构架”^[28],以防止陷入反对个人主义而单纯主张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的苏联式的集体主义教条。在这种意义上理解,邓小平曾指出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29]225}的深刻蕴意。例如,在世纪之交的经济改革领域中,存在着“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的纷争,就涉及市场主体(个体)与国有经济(国家)的发展趋势与所有制问题。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0]。这说明,不管是改革开放初期还是现在所处的新时代,都应从国家与个体两个层面来理解社会主义现代性,同时强调现实中个体与共同体主体性培育和生成的重要性及其辩证关系。因此,凸显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中的承认思想,汲取马克思社会整合与个人自由相统一的思想,构建个体与集体和谐的共同体,对中国现代性建构有重要的启示,为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坚定“四个自信”与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实现“中国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新建设方略提供了思想资源与价值支撑。

参考文献:

- [1] 王凤才. 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下)——对批判理论三期发展的批判性反思[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3(1): 101-110.
- [2] 罗骞. 重建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范式——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及其意义[J]. 天津社会科学, 2006(6): 39-41.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结构化理论大纲[M]. 李康, 李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6] 郗戈. 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7] 沈语冰. 透支的想象: 现代性哲学引论[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3.
- [8] 朱学勤.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4.
- [9]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 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10] 霍耐特. 为承认而斗争[M]. 胡继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11] 胡云峰. 霍耐特承认理论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7.
- [12] 王福生. 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四副面孔[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7): 99-105.
- [13]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上卷[M]. 贺麟, 王玖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4] 科耶夫. 黑格尔导读[M]. 姜志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 [15] 黑格尔. 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三部分[M]. 杨祖陶,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16] 程广云, 鹿云. 承认理论批判——从黑格尔到泰勒、霍耐特[J]. 学习与探索, 2014(2): 1-8.
- [17] 姚龙华. 黑格尔哲学中“承认问题”的双重维度[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4.
- [18]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19] 汪行福. 个人权利与公共自由的和解——现代性视域中的黑格尔法哲学[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1): 54-63.
- [20] 陈良斌. 承认哲学的历史逻辑——黑格尔、马克思与当代左翼政治思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21] 张盾. 交往的异化: 马克思《穆勒评注》中的“承认”问题[J]. 现代哲学, 2007(5): 16-20.
-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27] 胡大平. 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8] 王洪波. 中国社会深度转型过程中个人与共同体间的关系研究[J]. 江汉论坛, 2014(2): 72-75.
- [2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30]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1.

[责任编辑 文 川]